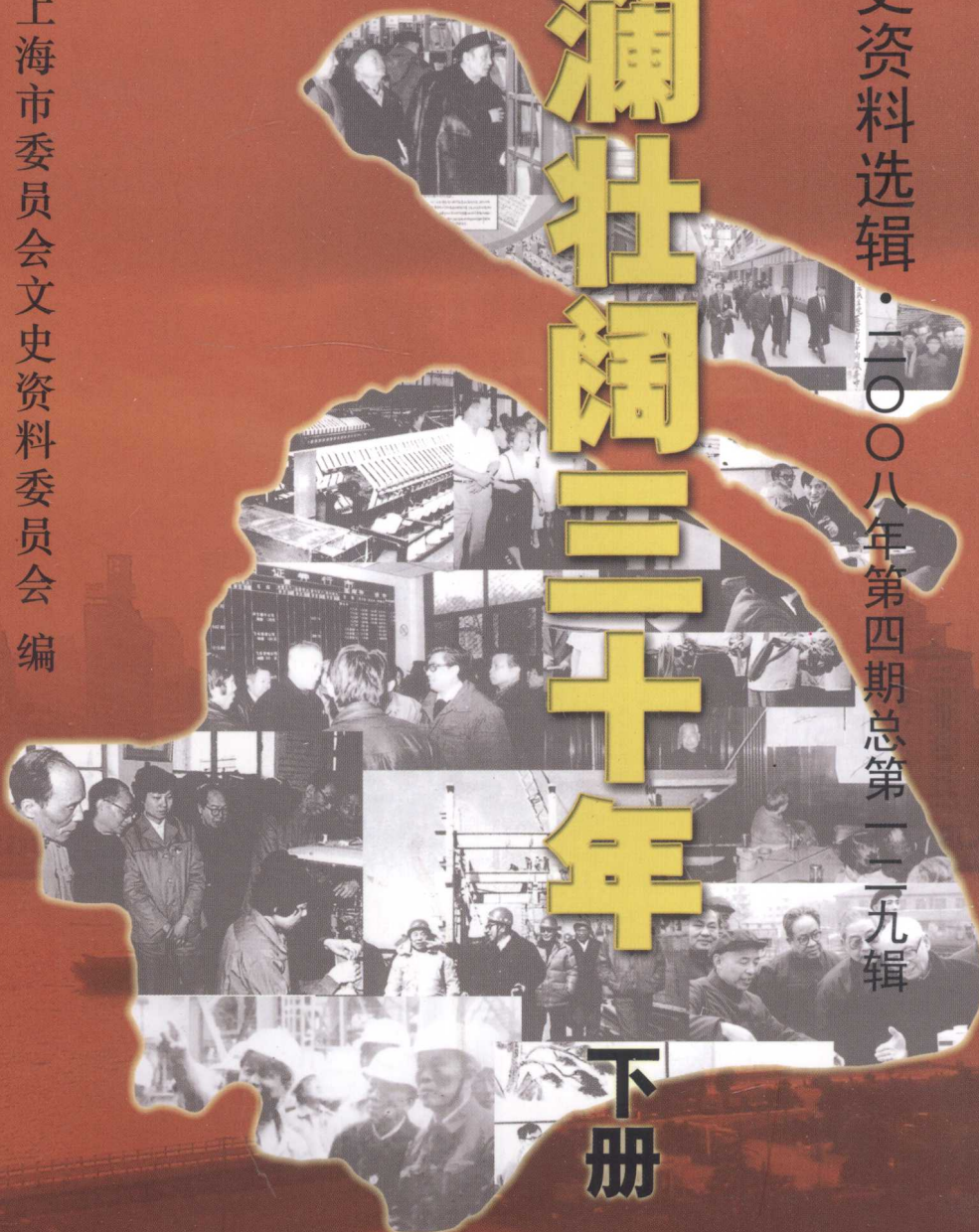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二〇〇八年第四期总第一二九辑

波澜壮阔三十年

下册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波澜壮阔三十年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A collage of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s showing various scenes of student life. The images are arranged in a layered, overlapping fashion. One photo shows a group of students in a classroom setting, possibly during a lesson or activity. Another photo shows a group of students posing together, some standing and some sitting. A third photo shows students in a hallway or common area, with some students looking towards the camera. The collage captures different moments of daily life at the school.

目录

《于无声处》创作演出实录	宗福先	1
局中人谈“皇甫平事件”	汇 辑	17
我所经历的上海第一次思想解放	金维新	70
一位女记者的上海改革开放亲历纪实	吴复民	74
令人难忘的两次现场办公	陈祥麟	117
八年，我的这一棒	陆吉安	127
两个批示和三件难事	范征夫	136
推动落实政策 促进改革开放	范征夫	154
三件往事	邓伟志	167
参政议政的回顾与思考	唐齐千	175
一步步走到改革开放	陶敏之	187
也谈爱建公司的创始	宗之琥	205
30年前改革中首创的新经济模式	陈朝富	211
风雨行医路 拳拳赤子心	方厚贤 杨 容	216
从知青县长到职业社区社会活动家	范向东	242
我与历史老人三十年	孔海珠	283
我给小平同志写信	邹荣中	292
人生如歌	唐长馥	295

《于无声处》创作演出实录

宗福先

—

三十年前，1978年5月，我创作了话剧剧本《于无声处》。

1976年清明节，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百万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我是在4月6日知道这件事的。一位参加了这次运动的朋友，4月5日直接从天安门广场上火车，来到上海，在老北站对面、天目路上一家小旅馆里告诉了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一切。他带来了天安门的热血，直呼其名地咒骂着“江青、张春桥狗男女”，当时，听得我也热血沸腾。因为对于这些“狗……”我也早有腹诽——尤其是他们对待敬爱的周总理的恶毒的态度——只是不敢说出来；现在才知道，原来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所有的人都这么想！顿时有了一种找到自



1978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彭冲同志接见剧组人员

己的队伍的感觉。而对于这位朋友以及所有敢于在天安门广场上公开挑战“四人帮”，大声喊出自己的爱、自己的恨的人们，我充满了崇敬！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骨，我自愧不如。

但是，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就在这位朋友走后的第二天，4月7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里宣布：天安门广场事件为反革命事件！当时，我感到头皮发麻，真是兜头一盆凉水，一直凉到心里。我觉得那个夏天是最难熬的，天也特别闷。我一直在反覆吟诵鲁迅先生的两首诗：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我觉得鲁迅时代的情感，特别符合自己当时的心态。同时，我看着街上面无表情的人们，心里特别悲哀。我想：中国人都怎么啦？明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一个个还都是那么温顺！

1976年10月，我陪母亲去黄山。那时山里不通任何音讯。出来时，长途汽车经过黄山茶林场，突然山上出现大幅标语：打倒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满车人顿时鸦雀无声。到了南京，听到各种传言，甚至有人说上海的武装民兵与解放军已经打起来了。我连夜回到上海，上海平安无事，满街都是揭批“四人帮”的大标语、大字报。第二天，我走到外滩、人民广场去看大字报。那时的大字报其实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都是标语口号，但是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也有单位组织的游行队伍，敲锣打鼓、兴高采烈。看着人们脸上由衷的笑容，我突然意识到我错了：人民不会永远沉默！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对：于无声处听惊雷！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酝酿创作一个剧本：1976年那个闷热的夏天，一个被“四人帮”通缉的天安门广场英雄来到了上海……

经过长时间的搜集素材、酝酿构思，1978年5月，我利用病假在家休息的机会，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一气呵成，完成了剧本《于无声处》。

二

当时，我是上海热处理厂的热处理工，也是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小

戏创作班的学员，我就是在这里学习戏剧创作的。写完剧本后，我就交给了工人文化宫业余表演班的导演苏乐慈。她看完剧本后非常喜欢，事后她说有两点吸引她：一、这是个说真话的剧本，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歌颂了天安门事件；二、剧本人物个性鲜明、矛盾冲突尖锐、悬念不断，而且一反“四人帮”概念化、“高大全”的流弊，写出了人与人之间那种久违了的真诚的情感的交流和久违了的亲情、友情、恋情，非常好看。苏乐慈决心要排这个戏。但是群众业余文艺当时有规定，只能排小戏、独幕剧，《于无声处》却是个四幕大戏。苏乐慈努力说服领导，终于获得了领导的批准与支持。

1978年7月，市宫话剧队开始排练《于无声处》。演员全部是工人，又是业余时间排练，十分辛苦。比如演欧阳平的张孝中在吴淞的上钢一厂工作，演梅林的施建华在老闵行的重型机械厂工作，演何为的冯广泉在吴泾化工厂工作……他们每天白天上班，下班后从四面八方赶到西藏路的市宫排戏，常常路上就需要一两个小时。吃不成晚饭，买两个馒头路上啃啃充饥是经常的事。而且那时排戏、演戏都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包括导演、演员、编剧，全都没有一分钱；只是晚上排戏超过十点，有两毛七分中加班费。但是，剧组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毫无怨言，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个戏的排练！当时大家心里也明白，天安门事件还是反革命事件，排这个戏不是没有风险的。但是，没有一个人退缩。相反，大家都充满了挑战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

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对于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因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十五日专电 中共北京市委在最近举行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

会上宣布：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

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978年11月16日，《于无声处》在北京首演的当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中共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

的激情与勇气。有一次张孝中跟我开玩笑，说：我们为你这个戏卖命，要是成功了你可别忘了我们。我说：一言为定，成功了 I 请客吃饭，可是万一我“进去”了，你可得给我送饭！当时在场的演员们纷纷说：没问题，我们轮流给你送饭！三十年后的今天，许多人回忆起这段日子来，还是津津乐道，说：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

1978年9月22日，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在工人文化宫的小剧场里上演了。这是非常简陋的一次演出，一共六个演员一场景，服装是大家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道具也很简单，下雨声就是演员自己从家里拿来一个竹扁，撒把黄豆在后台摇。舞台又特别地小，十步就跨过来了，票价才一角钱，也没有广告宣传，剧场也坐不下多少人……就这样，我们几乎是悄悄地开始了《于无声处》的演出。

第一场彩排是招待文化宫内部的职工以及家属，有老人有孩子，开场前一片乱哄哄，像小菜场一样。我非常着急，这毕竟是我的第一个戏的第一场演出。但是戏开演不久，剧场里就逐渐安静下来了，这种安静谢幕。而演员因为是业余演出的内部彩排，根本没打算谢幕，苏乐慈叫大家：快，谢幕，谢幕！演员说：啊？还要谢幕？匆匆回上台去。散场后，我站在大门口，听见两个小姑娘一路走一路说：蛮好看的，下次再来看一遍……我知道观众们接受这个戏了。那一天我和我的伙伴们深更半夜都没回家，兴奋地在大街上走着，说着，笑着。

过了没几天，文化宫卖票的小窗口前就开始排队了，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文艺界的老前辈们也纷纷前来看戏：黄佐临、朱端钧、吴仞之、袁雪芬、茹志娟……其中除了茹老师是我早就认识的——是她的鼓励才使我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的——其他前辈都是我仰慕已久的。10月1日，上海市总工会领导李家齐、张伟强还带了全市的劳模来看戏。不久，外地的文艺团体也开始来上海看戏了。

戏越演越热，人越来越多，票越来越难买。眼看我们的创作成果受到欢迎，市宫话剧队的人全都兴奋不已。

10月12日，《文汇报》刊登了长篇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媒

体第一次报道《于无声处》。通讯的作者是文汇报记者周玉明，她负责跑群众文艺这一块。9月30日，她从国庆文艺演出广告中看到半个火柴盒大小的一块《于无声处》演出信息，她想：于无声处背后肯定有文章，于是来看戏。她泪流满面地看完了戏，立刻到后台来找苏乐慈、我和演员们采访，她说：我要告诉天下人，你们演了一出说真话的好戏！在《文汇报》各级领导的支持下，这篇通讯发表了。

三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随着这篇通讯的发表，十月下旬开始，让我们吃惊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先是10月25日，突然市委宣传部三位副部长洪泽、江岚、吴健一起到市宫来看戏。看完后洪泽同志说：“我们三个意见一致，不要改了，就这样演。这个戏很好，六个人物都站得住。以前写批四人帮的戏都有些概念化，这个戏没有，很好。”同时，他说剧场太小了，有中央领导看戏，要剧组换到友谊电影院去演出。那里的舞台比原来的大两倍，为此还由上海戏剧学院为我们重新设计、做了一堂景。

10月28日演出时才知道，是胡乔木同志来看戏。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韩哲一，市委宣传部长车文仪等陪同。看完演出他上台接见剧组全体

人民的愿望 人民的力量

——评话剧《于无声处》

本报特约评论员

最近中央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正在这个时候，上海《于无声处》剧组来到北京，为首都人民演出。这是革命者为党的中央领袖祖国战略决策的伟大胜利，是人民力量的伟大胜利。

话剧《于无声处》的出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几千万人争相阅读这个剧本，在剧场，在电视荧屏，观众和演员一道悲哀、流泪、愤怒和愤怒，和着激昂的声音喊出：“人民不会永远沉默！”一个话剧，在演出和发表之后被破的时间，就引起群众如此广泛的共鸣和赞赏，这绝不是经常发生的。

人们都在想，它所吸引人心的力量从何而来？

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的艺术表现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出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许多城市的亿万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运动，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是深埋在八亿人民心中，使广大群众长期不能平静

和认真思考的问题，《于无声处》的情节和人物，用艺术开掘的客观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揭示了“四人帮”如何把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和历史的重大悲剧。

“四人帮”从一出现，就是跟中国人民根本对立的。他们窃取党和国家的部分权力的过程，也是他们向全体中国人民进攻的过程。梅林、戚本禹和姚文元一样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生入死几十年打下这个几百万平方公里的江山，如今却连自己的立锥之地都不给他们”。欧阳平因为为什么“叛徒”的儿子，“四人帮”就强令他离开部队，取消他的职务免职并勒令“一死之内成了反革命分子”、“御敌于外”、严有工作。正是对党的背叛行为，被视为什么“走白台道路”？刘少奇被逮捕精神失常。向谁革命，天安门广场的何苦，也由于梅林一家的造谣、与情人的长期分离，而深深地痛苦。广大人民群众同“四人帮”之间的矛盾，贯穿着十多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人民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早已存在。但是，直到天安门广场的事件发生之前，可

以说，这种斗争还是零星的，还没有形成一种“四人帮”以沉重打击的群众运动。其中最危急的时刻，如梅林和姚文元，已经认识到“四人帮”的本性和斗争的严重性。梅林说：“要不是‘他们’搞，党会战胜‘他们’的！林彪不是已经被党枪毙了吗？‘他们’也快了！”另外一些人，如何力、何家、刘秀英，还暂时处在徘徊、怀疑和忍耐的阶段。一九七五年，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林彪集团无主席党中央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进行整顿。经济整顿开始迅速好转，人民有了期望。接着，正如华国锋同志在庐山九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指出的，“一九七六年一月，敬爱的周总理不幸逝世。在这前后，‘四人帮’霸权地位上升起来，迫不及待地要把党权、政权、军权都夺到他们手里，这就展开了又一个极其严重的斗争”人民和“四人帮”的矛盾，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程度。这样，在“四人帮”罪恶统治周总理，并且用法西斯手段血腥镇压悼念周总理的群众的时候，人民既得不能再忍耐了。（下转第三版）

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

人员，我在后面，他问：我能见见作者么？我走到前面。他仔细打量了我一下，问：你生的什么病？我愣了愣，说：哮喘。胡乔木说：感谢你为我们写了个好戏。希望你养好身体，写出更多的好戏。事后我们知道，他是看了《文汇报》周玉明的报道才来看戏的，报道中写了我是抱病创作这个剧本的。

在此之前，《文汇报》的总编辑马达同志毅然决定在报纸上全文发表《于无声处》剧本。也恰巧在这一天，10月28日开始，《文汇报》破天荒地用三天的时间连载剧本。《解放日报》、《文汇报》还分别在第一版用大字标题高调宣传这个戏。紧接着，北京所有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都开始宣传这个戏，也是调门越来越高。

11月初，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同志特地飞到上海看戏。看完戏他上台来代表文化部、代表黄镇部长邀请剧组晋京公演，他对我们说：怎么样，到北京来演吧？我们一下子欢呼起来。

11月7日，中央电视台要求上海电视台向全国直播《于无声处》，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也是上海头一次向全国直播电视节目。因为技术上还有些担心，所以中央电视台的广告上还特地写明是“试转”。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彭冲同志也来到直播现场看戏。演员张孝中看到彭冲同志看戏时落泪了。看完戏彭冲同志接见我们说：戏很好，很感人，人民需要这样的戏！

最后确定，由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邀请剧组晋京公演。11月13日赴京，14日抵达，16日公演。

去京演出前，许多前辈来到剧组，帮助我们对这个戏进行精加工。佐临老师就几次来文化宫指导排练。朱端钧老师身患重病，但11月5日晚他仍然在上戏剧场坚持看完了《于无声处》，我和导演苏乐慈送他回家，他气喘嘘嘘地说：“戏很真挚、充满激情，我要再想一想，8号你们来，我们详细谈。”可是，7日他就倒下了，再也没有醒来……

11月11日市委书记严佑民等领导到总工会为剧组送行。这天还发生

了一个小插曲，同来送行的车文仪部长对我说：宗福先你很冷静啊，你不想当暴发户。我吓了一跳，这是我私底下说的话：他怎么知道了？

四

实际上那个时期我一直想弄明白、但是一直弄不明白：戏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宣传急剧升温、铺天盖地：这个戏真有那么好，真有那么重要么？我对已经成为朋友的周玉明说：我担心两条：一是担心《于无声处》成为样板戏，历史的经验证明：样板戏绝无好下场；二是担心我自己成为暴发户，历史的经验证明：暴发户绝无好下场。事后周玉明告诉我：是她写了份情况送上去，大概车部长看到了。

许多年后，关于《于无声处》三十年前是怎样突然升温，从地方舞台走向北京舞台，从戏剧舞台走向政治舞台的各种历史资料都披露了，但是信息不尽一致。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张金才同志采访当年胡乔木的秘书



1978年11月，《于无声处》剧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怀念周总理，朗诵“天安门诗抄”

朱佳木同志以后写的文章《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胡乔木调话剧〈于无声处〉晋京演出始末》中介绍的，现摘录有关内容如下：

“《于无声处》在上海热演的时候，胡乔木正为修改他关于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文稿到上海调研。随同前往调研的有王耕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李更新（国务院研究室财贸组组长）、朱镕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和秘书朱佳木。离京之前，他已经从朱佳木那里听说，并看到了周玉明的这篇通讯，了解了这个话剧创作、演出的经过和受到观众热烈赞扬的情况，认为这部话剧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框框，喊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声音，值得重视。10月23日中午胡乔木到达上海。在从机场前往宾馆的路上，前来迎接的市委宣传部长车文仪问要安排些什么文娱活动，胡乔木提出能不能看看话剧《于无声处》。

……为接待胡乔木，上海市委宣传部几位负责同志先到文化宫看了一次，觉得这个剧场太小了，就把演出地点安排到了中苏友好大厦的友谊电影院。10月28日晚上，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韩哲一陪同胡乔木观看演出。就在这一天，《文汇报》开始登载《于无声处》剧本。胡乔木看完演出后非常高兴，走上台与编剧、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会见并合影留念。合影后，他提出要会见作者。人们就把宗福先拉到胡乔木面前。胡乔木看了看宗福先，突然问，你生的什么病？宗福先一愣，说是哮喘。原来胡乔木注意到了上述通讯里所写的作者带病完成剧本这一细节。胡乔木希望宗福先养好身子，争取写出更好的剧本。宗福先说这个剧本还有很多毛病，胡乔木说：这个剧本写得很好。

临近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之际，广大干部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愈加高涨。胡乔木感到，此时调《于无声处》剧组到北京公演，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对思想解放运动，必将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所以，他于10月底回到北京后，即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胡耀邦非常赞成调《于无声处》剧组来京演出。按照他们两人的意见，11月4日，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向剧组发出邀请，并成立了以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为

组长的接待组。

在胡乔木指导和周巍峙等组织下，11月7日，中央电视台转播了《于无声处》的演出，在国内外引起轰动。11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赵寻的评论文章《戏剧舞台上的一声惊雷》。这天上午，《人民戏剧》编辑部邀请首都戏剧界人士举行座谈会。这些活动都为欢迎《于无声处》剧组进京演出营造了声势。

事实上，《于无声处》的演出，已经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讲到了《于无声处》。陈云在发言中列举了6个应该由中央考虑并作出决定的比较重大的问题，其中第五个就是天安门事件。他说，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但是最近，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负责接待《于无声处》剧组的周巍峙同志到上海。他对我们说，邀请《于无声处》进京的决定就是文化部作出的，是他提议的，部里同意了。他说：他与夫人王昆都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在革命队伍里成长的，“文革”中，周总理三次保他们夫妇。周总理逝世，他们悲痛欲绝。“四五”期间，他天天上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同时，也表达对“四人帮”的憎恨。所以当他知道上海有一出歌颂天安门事件的话剧，一听这个题材就感到合拍，立即提出应该调到北京来演出。后来黄镇部长就要他负责全部接待工作，许多事情都是他安排的。

我想，不管是哪一位领导倡议和决定调《于无声处》进京的，他们的想法都是完全一致的：天安门事件应当平反，歌颂天安门事件的《于无声处》应当晋京公演，这对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有促进作用。

五

就在陈云同志重要讲话的第二天，11月13日，由总工会张伟强副主任带队，《于无声处》剧组登上了赴京的列车。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各大媒体全都派出记者随行采访。上海电影制片厂准备把这个戏搬上银幕，所以也有人随行。



1978年，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团演出《于无声处》剧照

11月14日中午，剧组到了北京。我们根本没想到的是，隔着车窗只看见站台上已经挤满了欢迎我们的人群！一下火车，就听见了热烈的掌声，就看见大红横幅“热烈欢迎上海《于无声处》剧组”。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北京文化局、部队文艺团体的领导，吴雪、金山、赵寻、阿甲等同志，还有北京人艺的夏淳、于是之，以及首都文艺界三百多人到车站夹道欢迎！要知道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崇拜的前辈大艺术家们！他们列队欢迎我们，帮我们拿行李，与我们握手，拥抱。看着他们热情、真挚的笑脸，我们非常感动。当时我们剧组还是一支业余的话剧队，我们都是普通的工人，都是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只是因为排演了《于无声处》就受到首都文艺界的领导、前辈和朋友们用这么隆重的仪式欢迎，我们真的感到忐忑不安。

到京后，立刻有人告诉我，曹禺老师约我今晚去他家里见面。当时我真是兴奋无比！曹禺老师我景仰已久，我非常崇拜他的剧作《雷雨》、《原野》等，创作《于无声处》时，我就是从这些剧作中汲取了许多养

料。从他的剧本中学习到的戏剧创作技巧，让我终身受用。

来北京前我曾经在上海作家协会随口说过一句：这次去北京能见到曹禺老师就好了。后来当时在巴老身边帮助他整理一些资料的彭新琪同志见到巴老时也就随口说了一句，宗福先去北京有这么个愿望。不料巴老竟然亲笔写了封介绍信，托彭新琪转交给我。这是封用毛笔书写的信，上面写着：家宝：我推荐一个年轻人来见你，他写了《于无声处》，你一定要见见他……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巴老会这么郑重其事地、亲自帮助一个年轻的、陌生的业余作者实现自己的心愿！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复印机，也没有这个脑子，这封信到京后我就交给了曹禺老师，自己没留底，使我后悔至今。

我终于见到了曹禺老师！他详细地询问了我创作经过，特别是哪些东西是从生活中来的？人物生活中有没有原型？我再三说，是从他的剧作中学习到了许多戏剧创作的精髓，曹禺老师则说：你不要过多从技巧上去总结，你这个戏贵在真实，你的人物都是从生活中来的，所以能打动人，有感染力。我们整整谈了两个小时，最后曹禺老师说：等我十六号看了戏，我们再约时间细谈。后来，果然他又约我详谈了一次关于戏剧创作，使我受益匪浅。

11月16日上午，剧组正在虎坊桥北京工人俱乐部走台，准备当晚的演出。一位记者陪着一个瘦长的青年挥动着人民日报来了。当记者介绍他就是著名的反“四人帮”的英雄韩志雄的时候，大家情不自禁地鼓掌欢迎。他拿着当天的人民日报，向我们宣读了头版头条刊登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我们激动得欢呼起来，欢呼人民力量的伟大胜利！我们写戏的时候、排戏的时候、演戏的时候，不都是为了这一天么？！这一天终于来了，而且正是我们在京首演的这一天！

韩志雄还跟我们同车回到招待所，我们在一起谈了约两个小时。他对我说：你们六个人喊出了八亿人的心里话！真了不起！我说：你才了不起！你两年前就大声喊出来了！他朴实地说：“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这天的《人民日报》还在头版发表了一万多字的、署名“特约评论员”的长篇文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据张金才文章介绍，这是胡乔木同志亲自指导下完成的。

11月16日晚，在近似狂欢的气氛中，文化部、全国总工会为《于无声处》举行了隆重的首演仪式，剧场里一片欢腾。当主持人、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吴雪说到“今天，北京市委郑重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于无声处》在今天首演有着多么不平常的意义”时，台下掌声雷动，许多观众激动地起立、欢呼。

出席观看《于无声处》首演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苏振华，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主席、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副部长朱穆之、廖井丹，文化部部长黄镇，副部长刘复之、周巍峙、贺敬之、王阑西、林默涵、司徒慧敏、姚仲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马纯古、康永和、黄民伟、宋侃夫、王崇伦、韩荣华，北京市委书记毛联珏、李立功，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还有文艺界前辈与领导周扬、曹禺、冯牧、刘白羽、赵寻、张光年、李伯钊、周恒、金山、张庚、肖甲、阿甲、凤子、欧阳山尊等，参加过天安门事件的反“四人帮”的英雄代表也观看了首演。

那天，是个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盛大的节日！

11月19日，我们还走进京西宾馆，为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央领导举行专场演出。那天来了许多领导。但由于规定是内部演出，不见报、不上台，我们也只能在规定的区域内活动，所以看不清来了哪些领导。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冲同志和方毅同志在开场前来到后台看望了大家。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工作会议实际上是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充分准备的。

六

在京演出期间令人难忘的是北京热情的观众！

11月21日起，《于无声处》对外公演四场，20日下午卖票，票价是四

角钱,《人民日报》等北京各报都登了广告。不料19日上午8点就开始有人排队等候!下午北京市民从四面八方赶来排队,到19日晚上,剧场门口已经挤了近千人。北京11月的夜晚多冷啊!可是一群群北京人裹着棉大衣硬是站在冷风里等,等着明天买票。20日中午开始发号时排队的人已经有几千,超出可卖票的好几倍!看这个架式,四场票哪里能够满足这个拥挤的人群?后来汇报到了《于无声处》接待组组长、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那里,他果断决定:加演三场,尽量满足大家!但票全部卖完以后,一直到20日傍晚,还有数百人等在剧场门口,希望能出现什么奇迹,让他们买到票子。

在北京难忘的还有与反“四人帮”的英雄们的几次见面。

11月24日,团中央表彰参加“四·五”运动的二百多位英雄。到向英雄献花的时候,也给我戴上了一朵大红花。我急了,说:我当时没参加过反“四人帮”!立刻身边好几位真英雄涌上来抓住我摘花的手,说:你怎么没参加?你知道几个月前我们这些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吗?你知道你们的戏起了多大的作用吗?你就是用你的戏参加战斗了你知道吗,你就是我们一伙的!

11月27日,共青团中央组织我们为天安门英雄举行专场演出,演出前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启立同志到后台来看望我们,说:今天人多,演出结束就不上台了。不料结束后幕还没闭紧,人们就一涌而上,有的干脆就是从台口蹦上来的,挤满了整个舞台!他们紧紧地抱住我们,哭啊、笑啊、跳啊……后来许多人都成了我们的好朋友。

在京期间我们先后演出了四十多场:应外交部的要求为各国驻华使节演出,应中联部的要求为外国在华专家演出,还为国务院各部委、中央党校、北京市委市革委、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北京市文艺界、财贸部、北京市教育局、北京业余作者、北京化工厂、北京电子厂、首都钢铁公司、门头沟煤矿等等许多单位演出,所到之处都受到首都各界的热烈欢迎,也使我们自己深受鼓舞。

我记忆中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有就是那些普通的老百姓。由于媒介

铺天盖地的宣传（当时有朋友戏称：你们的待遇跟西哈努克一样，走到那里都有摄像机、照相机跟着），我们走在街上经常被人认出来。而热情的北京人一旦认出你来，可就不放你走了。有一回在北海，我就被一群北京人“围困”了一个多小时。临走时我说：有人写匿名信刻毒地咒骂我，预言我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绝无好下场；万一真有那一天，我会想起今天来的，我绝不后悔！还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一位中年妇女不停地看我。后来我下车她也下车，仍然跟着我。我停下来问她：您有什么事吗？她眼泪下来了，哭得很伤心，但什么也不说。最后，她说了一句：你写得太好了，就走了。当时我猜想：她的家庭一定和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在“十年浩劫”中有过惨痛的经历，真是希望恶梦不再！

在我那时收到的上千封来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诉说这种惨痛经历的。其中有一封是天津一位同志写来的，说她母亲的经历与戏里的梅林一模一样！我后来还特地去天津看过她（李伯钊同志也对我说过，她的经历有一些就与梅林相同）。来信中还有一封是于伶老师的，那是11月下旬我们在京演出时转来的。他对《于无声处》表示祝贺，同时，又转来了孙冶方同志的一封信，对剧本提出了非常中肯的修改意见。遗憾的是80年代我住在老大楼的底楼，一个旅行袋的信件全部被老鼠咬得粉碎，让我非常痛心。

我还想说一说的就是胡耀邦与邓颖超两位领导人对我们的关心。在京演出的当时，我没有机会见到他们，但是我知道耀邦同志在很多场合赞扬过我们的戏。我看到过一份文件，是他的一次讲话，其中说到：宗福先是热处理厂的工人，但《于无声处》就不是一味热处理，也有冷处理嘛，有些事就要冷处理。在另外一次讲话中说到青年人要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他也举了《于无声处》的例子。我们在京演出时邓颖超同志则特地打电话给有关部门，说：北京的气候干燥，《于无声处》的演员嗓子都哑了，你们要让他们多吃水果。从那以后，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发一斤水果。在第二年的四次文代会上，我见到了他们。当时我走到邓颖超同志面前，我还没有开口她就举起手来点着我说：我认识你，你叫宗福先。她热情地